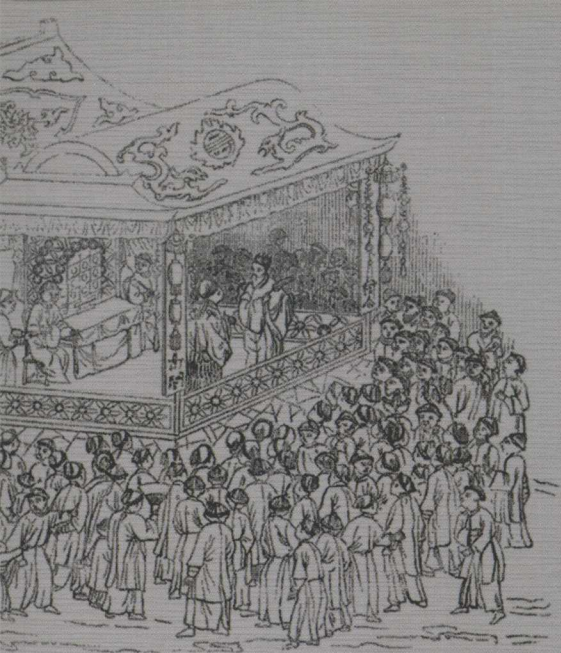


中国戏曲在法国的
翻译与接受

(1789—1870)

李声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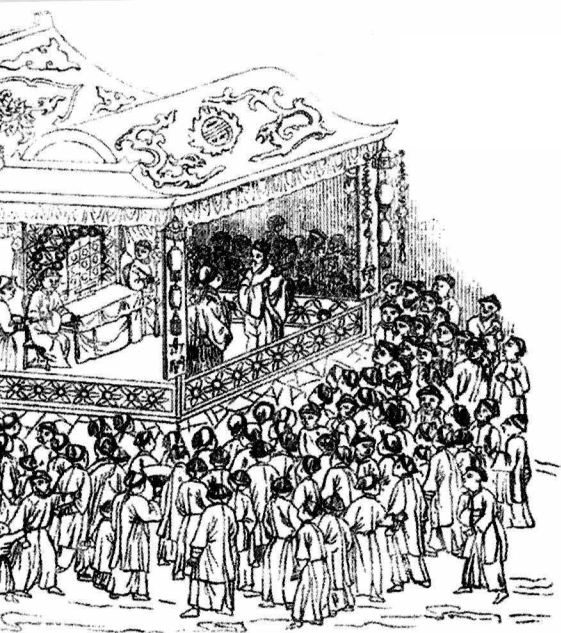


L A T R A D U C T I O N E T L A
R É C E P T I O N D U T H É Â T R E
C H I N O I S E N F R A N C E
(1789 - 1870)

中法文学关系
研究丛书
孟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曲在法国的 接受 ——1870)

LA TRADU - - - ET LA
R É C E P T I O H É Â T R E
C H I N O I S R A N C E
(1789-1870)



中法文学关系
研究丛书
孟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 1789~1870/ 李声凤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9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6211-5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古代戏曲—法语—文学翻译—研究—中国—1789~1870 ②古代戏曲—戏曲史—研究—中国—1789~1870 IV. ① H325.9
② J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1032 号

书 名	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 (1789—1870)
著作责任者	李声凤 著
责任编辑	初艳红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211-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alicechu2008@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304 千字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谨将此书

献给所有陪伴和见证了我成长的老师们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总序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地位与作用》的文章。写那篇东西的目的,一是为了回应国际上风行一时的比较文学“消解论”,二是为愈来愈被边缘化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正名。《北京大学学报》刊发此文时附有如下“摘要”:

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的学科,只要文化交流一天不停止,比较文学就没有被“消解”的理由。作为这门学科最原初的研究领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学科中的地位曾大起大落,至今仍在某些地区、某些学者中受到轻视。然而,它一直在反思中前进,它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引入了问题意识,引入了文学批评的精神。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维系着本学科的身份与根本,它过去是,今天与未来也应是本学科最基本、最主要的研究内容。

这个颇有些“檄文”味道的“摘要”,是我应编辑部要求而自拟的。我在这里重新引用它,皆因它概括了那篇文章的核心观点,而末尾几句,尤其点明了策划这一套“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的基本立意。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摇旗呐喊。不过,毕竟是人微言轻,虽聊胜于无,却很难有大的反响。面对外部世界热闹非凡的大环境,面对人们求新求变求大的普遍心态,面对电视台、广告牌里充斥着的“闪亮登场”“华丽转身”“震撼推出”一类的夸张表述,那些希冀被人仰视、受人推崇、轻而易举地就能占据学术制高点的种种举动就都变得不难理解了。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具体到中国而言,更多的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则没有这般显赫、亮丽的外表,更没有这个时代人们竞相追逐的高回报率。它要求研究者屁股坐下来,老老实实从梳理资料开始,从认真阅读文本开始,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点点滴滴地积累和建构起足以支撑一个课题研究的宽广的知识场。不仅如此,它还要求研究者具有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批评意识,质疑现象,提出问题,探幽索微,揭示本质。这是何等清苦而寂寞的过程!在凡事都讲效率、讲性价比的当今世界,又有多少人愿意承受这般的冷清和辛劳?但我很庆幸,在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

文化研究所执教的二十年时间里,有一群学生愿意与我一样,做这个一点都不“华丽”、更不“震撼”的基础性工作。这是我的幸事,更是学科的幸福。

如今他们已成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里。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在忙碌的教学、科研、学术活动中依然没有丢弃如此需要时间、需要砥砺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有了一群人在踏踏实实地做,在课堂上讲,在研讨会上谈,在文章中写,再去指导他们的学生……这就变成了一种既成事实。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远胜过千言万语的论证和宣传,它让本学科最基础、最本质、最核心的研究方向得以发扬,得以光大,得以传承。

这套“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就是专为他们设计的。我希望借此平台展示他们的研究,向学界推荐他们的作品;同时也在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丰富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而之所以使用了限定词“中法”,则是受我本人研究范围所限。我是专治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生们也就大多沿袭了此一方向。当然,如有可能,我也希望未来能推出其他双边或多边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来。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和法兰西是两个响亮且诱人的名字。这两个文化大国,各自以其璀璨的文化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彼此都对对方产生过积极、深远的影响,又都从对方那里汲取了有益的成分来革新、滋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使其生生不息。这样一部丰富、瑰丽的历史,为中法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研究对象与视角。

本丛书没有愧对这样的多姿多彩,它的选目及作者同样也异彩纷呈:入选本丛书的所有论著,都是作者们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订而成。丛书的作者既有中国人,也有法国人;他们的论文既有在北大答辩的,也有在巴黎四大答辩的,其中有一些是在中法双方导师合作指导下完成的。丛书涉及的内容不仅是中法文化、文学间双向的对话、接受、互视、互补,而且横跨了数个世纪,涵盖了整整一部中法文化交流史:从两国间文化交流滥觞的17、18世纪,直至交流已成定势、成共识的21世纪。所处理的文本则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除了戏剧、小说、诗歌外,也不乏难以归类的记游作品、报纸杂志,甚至一切可冠之以“文”的材料……同样纷繁多样的还有作者们的研究方向:翻译研究、形象研究、媒介研究、文化研究,不一而足。而且往往在同一部著述中,又数个方向并存,彼此切换

勾连照应。

尽管有这般的千差万别,本丛书的著述仍然有着许多共通之处。首先是作者们的研究和立论都建立在第一手中西文资料的基础上。说到这一点,或许应特别指出,不管他们最终在哪里答辩,作者们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都曾在中国政府或法国政府的资助下,远赴对象国搜集资料、实地考察,呼吸异国的精神文化空气,切身感悟异国的文化氛围。其次是所有的论著都是个案研究。这就保证了这批年轻的学者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建构起相应的知识场,尽可能地穷尽相关资料,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成果的原创性、科学性。但这些从小处入手的研究,却不乏大的抱负。我们可以看到,入选的每一本书都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文学史关怀。研究中国文学流播法国的作者,汲汲于讨论中国文化因子、元素,为何和怎样参与了法国文学的变革;处理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作者,则念念不忘探讨法国文学、文化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作用。一国文学,因为与异文学的相遇、交流、对话而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比较文学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作者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从而也就丰富甚至改写了接受国的文学史。由此牵连出的,是作者们对变化过程的重视。而在这种对过程的描述和讨论中,文学史就必然与思想史、心态史、社会史,甚至经贸史、外交史相交叉、相关照、相联系。如此宽广的研究场域才保证了他们可以进而去探讨接受国的观念是如何在与异文化的对话、对质中渐变、革新的。不仅如此,这些年轻的比较学者们还有更高远的追求。他们知道:一国文学在异国的译介、传播、接受,不仅在时间上延续了原著的艺术生命,而且在空间上也由于跨文化变异而赋予了原著以新的意义。所有这些,都必将进入我们称之为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所以说到底,他们瞄准的是书写世界文学史。

以上这些共通点,既有对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继承,更体现出了作者们对方法论变革的自觉。我在“摘要”中强调的那些最根本的变化,完全可以引这些著述为证。令人欣喜的是,作者们并没有“鹦鹉学舌”般地照搬各种新概念、新理论,而是将一切适用的东西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研究中,并且以自己的实践和思考,再去补充和完善现存的理论和方法。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变革实践的参与者、亲历者,更是变革历史的建构者、书写者。这对他们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而历史——中国的、法国的、世界的比较文学历史,不是已经在变革的事实中铭记下了这些参与者、书写者们的奉献?

入选本丛书的所有著述,无一例外,都是作者们生平的第一本专著,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初出道者的特点:略显稚嫩,多少未脱博士论文特有的“学究味”,分析和探讨也都还有向纵深拓展的余地。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是“成长中的烦恼”。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们必定会“天天向上”。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2014年是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两国举行了多种纪念活动。我们选择此时推出这套丛书,自然是希望沾一点欢庆的喜气,同时也为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送上我们比较学者的祝福。为了能让这套丛书按时出版,北大出版社外语编辑部主任张冰、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专员易杰(Nicolas Idier)及其助手张艳、本丛书责编初艳红等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了我们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帮助,我谨代表丛书的各位作者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为专治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比较学者,能在古稀之年推出这样一套丛书并为之作序,实在是我此生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幸福!

是为序。

孟华

2014年10月10日写于京西

目 录

引 言	1
一、选题缘起	1
二、课题史	3
三、研究思路	7
 第一章 戏曲翻译在法国的兴起	9
第一节 18 世纪法国人对中国戏曲的认识	9
一、布吕玛神父与《赵氏孤儿》出版的可能关联	10
二、布吕玛有关中国戏曲的引述及其内涵	13
三、阿科斯塔记述与来华耶稣会士中国观的遥相呼应	17
第二节 推动戏曲翻译活动在法展开的两种力量	22
一、法国人对戏曲的传统看法在 19 世纪初所受的冲击	22
二、对《老生儿》的回应与法国学界捍卫其中国问题 话语权的努力	26
三、《玉娇梨》的成功与法国文学界对中国戏曲的期待	30
第三节 巴黎王家图书馆的戏曲藏书与汉学家对戏曲 翻译的准备	33
一、巴黎王家图书馆 19 世纪之前的中文藏书状况	33
二、戏曲藏书的整体状况及分期	35
三、法国汉学家与王家图书馆的图书采购	38
 第二章 儒莲的戏曲翻译及其对语言的关注	44
第一节 儒莲戏曲翻译活动概述	44
一、儒莲戏曲译本梳理	45
二、儒莲戏曲翻译活动的起始与分期	49
第二节 儒莲戏曲翻译的开端与马若瑟 ——《汉语札记》及其语言学习观对儒莲的影响	52
一、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与其《赵氏孤儿》译本的关联	53

二、耶稣会对戏剧的看法与马若瑟的汉语教学观	57
三、《汉语札记》及其语言教学观对儒莲的影响	58
第三节 从节译到全译的转变	
——“观念”或“能力”?	61
一、马若瑟与德庇时能否读懂元杂剧中的唱段	61
二、两种翻译策略后不同的着眼点	68
第四节 解密中国诗歌	
——儒莲戏曲翻译的关注重心	71
一、为诗歌语言“解码”——儒莲对戏曲翻译的解决之道	71
二、信息的流失、增加与文化前理解	
——以《灰阑记》译文片段为例	76
第三章 大巴赞的戏曲翻译与风俗研究	82
第一节 限制之下的选择	
——大巴赞的学术道路	82
一、儒莲对大巴赞学术生涯的影响	83
二、大巴赞戏曲翻译研究及其关注重点——风俗研究	86
三、风俗关注在剧目选择上的体现	91
第二节 风俗关注在戏曲翻译中的影响	
——以《伪梅香》译本为例	96
一、意译倾向带来的表达灵活性	97
二、大巴赞的期待视野与《伪梅香》主题的改变	98
第三节 筌路蓝缕的戏曲研究	106
一、对戏曲地位的重新思考	106
二、与社会历史紧密关联的戏剧史研究	113
第四节 “对话体小说”与传奇文体在法国遭遇的接受障碍	118
一、“对话体小说”(roman dialogué)概念的形成	118
二、“对话体小说”归属的改变及其评价	122
三、19 世纪欧洲对戏曲唱段抒情性的认识	124
第四章 中国戏曲在 19 世纪法国读者中的接受	129
第一节 19 世纪法国文化氛围与汉学家译作的传播	129
一、译作的出版发行状况	129

二、期刊书评对译作传播的助力	133
三、口头传播——沙龙、文社与人际网	135
第二节 传统中国形象在戏曲中的再现	
与异国情调的延续	139
一、对中国风俗的求证与戏曲中的儒教中国	139
二、对中西文化共鸣的追寻与戏曲中的诗意中国	143
三、虚构性作品中异国情调的延续	146
第三节 在异域发现灵感	
——浪漫派的关注与中国戏曲对 19 世纪法国	
文艺潮流的参与	149
一、法国浪漫派作家对中国戏曲的兴趣	150
二、法国浪漫派从中国戏曲中汲取的几方面养料	154
结 语	163
附录一 19 世纪法国译介的中国戏曲作品(出版部分)	166
附录二 19 世纪法国有关中国戏曲的介绍、研究与评论	188
附录三 阿科斯塔其人及其中国信息的可能来源	193
附录四 大巴赞《琵琶记》译本与中文原作回目对应表	195
附录五 儒莲书目中戏剧类作品文体表述列表	197
附录六 道光九年四华人旅法事考	200
附录七 19 世纪中前期法国购置中文图书的渠道	212
索 引	216
参考文献	221
后 记	243

引言

一、选题缘起

中法两国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欧洲对中国的考察,虽由西班牙、葡萄牙人率先发起,但随着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华势力的增长,法国很快在早期汉学研究方面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16—18世纪时,天主教来华传教士撰写的大量有关中国的游记与著述引起了法国公众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法国,它们共同促成了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高潮的到来。正如许明龙所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法国都是欧洲‘中国热’当之无愧的中心。”^①

在中西间文化交流往还的过程中,中国戏曲很早便借助传教士的翻译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731年,法国来华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将《元曲选》中的《赵氏孤儿》译为法语后寄回巴黎。^② 1735年,杜哈德(Du Halde, 1674—1743)神父将其收入《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第三卷,此剧遂在欧洲广泛流传。欧洲各国的剧作家纷纷将其改编上演,其中以伏尔泰以此为灵感创作的《中国孤儿》最为著名。^③ 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教举措也日益严格,中法往来转入相对低谷期。然而,1814年学院汉学在法国的创立,为处于沉寂之中的中法交流开拓出一条新路。中国文化得以借助典籍的译介和研究在法国继续传播,并逐渐对欧洲其他国家形成影响与辐射。在法国汉学家的积极推动和直接参与下,19世纪30、40年代,中国戏曲作品的翻译形成了一个高潮,不仅《灰阑记》《赵氏孤儿》《伶梅香》《窦娥冤》《琵琶记》等多个

① 参阅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② 参阅 Muriel Detric, “Traductions et réception du théâtre chinois en occident”, *Le Champ Littéraire*, réunies et présentées par P. Citti et M. Detric, Paris: Vrin, 1992, p. 133.

③ 参阅[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全译本先后出版,《元曲选》中所收上百种剧目也被全面介绍给法国读者。

大量剧目的译介顺理成章地促成了一系列戏曲批评与研究文章的问世,这使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对中国戏曲的掌握和理解由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鉴于1832年儒莲就任法兰西学院汉语讲席教授后,法国汉学在欧洲的引领地位逐渐得以确认,因而这一时期法国对中国戏曲的翻译与接受,从剧目选择到研究思路,对整个欧洲汉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839年,彼得堡《读书丛刊》杂志刊登了戏曲译作《樊素,或善骗的使女》,该剧正是1834年大巴赞翻译的《伶梅香》。^①虽然有中国学者认为该译本是从中文直接翻译的,但从译本发表的时间、剧目的选择、标题的译法,及前人研究中所提到的楔子与结局有别于中文本等情况来看,该俄文本很可能只是大巴赞法文本的一个转译版。再如德国汉学家福克(Alfred Forke)生前发表的唯一全译本,选取的也是儒莲曾翻译过的元杂剧剧目《灰阑记》。^②至于《西厢记》《琵琶记》这两部戏曲史上的重要作品,更是先后得到了多位汉学家的关注,而它们同样是由儒莲和大巴赞分别于1833年和1841年首次引入西方世界的。

部分中国学者也留意到,欧美汉学家在戏曲研究中,将关注中心集中于元杂剧,而对明清传奇极其忽视: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元杂剧都是研究者关注的中心。^③

.....

假如说西方学者承认中国戏曲史还有第二个黄金时代的话,他们给予这个时代的关注和研究却是极其不相称的。和杂剧研究相比较,明清传奇的研究少得可怜。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改善的迹象。^④

若将这一现象与19世纪法国汉学家的戏曲研究格局相比对,会发现两者极其相似,有理由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

儒莲、大巴赞对后世汉学研究中戏曲领域的影响,借助学术的传承性,甚至也体现于晚近的日本汉学中。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谈及狩野直喜的元杂剧研究时就说:

① 参阅孙歌、陈燕谷、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② 参阅同上书,第26页。

③ 同上书,第81页。

④ 同上书,第98页。

狩野直喜……留学时期他接触西方东洋学的业绩之一便是法国、英国人的元曲翻译。……西方东洋学又一兴趣是民俗学,元曲也是民俗学的很好资料。元曲中表现了丰富的庶民生活,这些在其他文献中是没有表现的。^①

显然,吉川幸次郎、狩野直喜等人不仅对 19 世纪法国的先期工作有所了解,而且他们所开展的元杂剧研究,从兴趣的产生到思路的形成均与 19 世纪法国汉学家的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②据中国学者研究,其他日本汉学家如青木正儿、盐谷温等在进行中国戏曲研究时,也留意并借鉴过西方学者,这同样牵涉到 19 世纪法国汉学家大巴赞的工作。^③

简言之,以儒莲、大巴赞为代表的 19 世纪法国汉学家,是继马若瑟、德庇时等少数先行者之后将中国戏曲引入西方世界的重要力量。无论从汉学史抑或戏曲西传史的角度来看,其工作的价值与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二、课题史

19 世纪时中国戏曲的西传,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在晚清时便渐为国人所留意。较早将其落于文字的可能是王韬^④,他在 1868 年写给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的书信中就曾谈及儒莲翻译戏曲小说一事:

侧闻足下虽足迹未至中土,而在国中译习我邦之语言文字将四十年,于经史子集靡不穷搜遍览,讨流溯源……始见阁下所译有腊顶字《孟子》,想作于少时,造诣未至。其后又有《灰阑记》、《赵氏孤儿》、《白蛇精记》,则皆曲院小说,罔足深究……

从“侧闻”二字来看,王韬的信息大约来自他当时交往的一些欧洲传教

^①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四卷元篇上自跋》第十四卷,第 596 页,转引自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25 页。

^② 张哲俊虽然从吉川幸次郎的学术史追溯中看到戏曲研究的起始不在中日,而在法英两国,但他将吉川幸次郎书中所提及的法国戏曲翻译判定为 18 世纪传教士的工作。而笔者认为,这实际上主要是 19 世纪法国汉学家的功劳。

^③ 参阅邓绍基:《从中外戏剧文化差异引出的断想——〈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序》,载孙歌、陈燕谷、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第 3—4 页。

^④ 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中也曾谈及儒莲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之事,但似未提及戏曲译作。

士,如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等人。^①作为传统文人,王韬对戏曲并不看重,在《与法国儒莲学士》中,他便称这些作品“皆曲院小说,罔足深究”,^②未作更多关注。1873年儒莲去世后,王韬再度提及戏曲翻译,语气稍有改变,称“虽皆曲本小说,而抉剔入微,明畅通达,人见之一览即解”,^③但很可能只是受到悼文性质的影响而已。

清末民初,徐珂所编撰的《清稗类钞》在戏剧部“欧人研究我国戏剧”条目下,也曾提及两位法国汉学家及其著述:

晚近以来,欧人于我国之戏剧,颇为研究……此外尚有《中国戏剧》二册,一为法人巴散著,一为法人格兰著。^④

这里所说的法人巴散,当指儒莲的学生——19世纪法国汉学家大巴赞(Antoine Bazin, 1799—1863),因为不仅“巴散”与“巴赞”两个译名读音非常相近,而且《中国戏剧》一书也正是大巴赞的代表作。^⑤《东方杂志》在1904至1908年的创刊初期,是一份带有“文摘”“选报”性质的刊物,其稿件来自各种中外报刊。^⑥因此,该条目内容很可能是据当时西文报刊提供的信息编撰而成。不过,王韬或徐珂,都不过将其看作一件逸事,信手写来,并未加以深究。

中国学者之中,最早从学术角度对戏曲西译情况加以考察的可能是王国维。1912年,他在《宋元戏曲考》“余论”结末处,以时间为序,陈述了海外对中国戏曲作品的译介,涉及数位英法汉学家及其译作多部:

至我国戏曲之译为外国文字也,为时颇早。如《赵氏孤儿》,则法人特赫尔特 Du Halde 实译于一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

① 有关王韬赴欧经历参阅[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王韬:《与法国儒莲学士》,王韬著,朱维铮主编:《弢园文新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55页。

③ 王韬:《法国儒莲传》,王韬著,朱维铮主编:《弢园文新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69页。

④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十一册,第5012—5013页。格兰可能指19世纪后半期的法国汉学家古兰(Maurice Courant, 1865—1935),他撰写过《中国戏剧》(Le théâtre en Chine)一文。

⑤ 现一般译为《中国戏剧选》(*Théâtre chinois, ou choix de pièces de théâtre composées sous les empereurs mongols*)。

⑥ 参阅丁文:《“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年,而裘利安 Julian 又重译之。又英人大维斯 Davis 之译《老生儿》在千八百十七年,其译《汉官秋》在千八百二十九年。又裘利安所译,尚有《灰阑记》、《连环计》、《看钱奴》,均在千八百三十四年间。而拔残 Bazin 氏所译尤多,如《金钱记》、《鸳鸯被》、《赚蒯通》、《合汗衫》、《来生债》、《薛仁贵》、《铁拐李》、《秋胡戏妻》、《倩女离魂》、《黄粱梦》、《昊天塔》、《忍字记》、《窦娥冤》、《货郎旦》,皆其所译也。此种译书,皆据《元曲选》;而《元曲选》百种中,译成外国文者,已达三十种矣。^①

以上简短的叙述虽然在细节上还存在一些偏差,如将《赵氏孤儿》译作的编者杜哈德(王国维译作“特赫尔特”)误判为译者,将儒莲(王国维译作“裘利安”)的法文名 Julien 错拼为 Julian 等,但追根溯源,有条不紊,且记载年代、译者、书名甚详,显见得已不是简单地记载传闻或摘录报刊,而开始进入严肃的学术研究范畴。

王国维之后,许多中国学者沿袭了这种将戏曲的海外传播视为戏曲研究之余绪的做法。这一方向的工作在 20 世纪 80 年代汇聚为一系列整理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状况的专门著述,以钱林森所著《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 年),王丽娜所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 年),宋柏年所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年)等几种为代表。这些著作根据国别、年代、作品,分门别类地清点了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情况,在当时的学术状况和学术条件下对中外文学交流史上曾出现的译作做了一些信息搜集与脉络梳理工作。但这批著作由于涉及语种较多,许多内容都采用了二手、三手乃至更远的资料,在信息的准确性上存在较多问题,已无法满足今天学术研究的需要。进入 21 世纪之后,相关研究工作虽有所进展,但语言问题所造成的缺憾仍未能得到很好的弥补。如孙歌、陈燕谷等合著的《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按国别和戏曲史阶段为区分,对中国戏曲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是这一领域中较具学术价值的作品。但此书由于参考资料以英文、日文为主,因此有关法国 19 世纪的戏曲研究的部分存在明显缺失,且受到英美汉学家观点的影响,认为 20 世纪前西方的中国戏曲研究均无足观,更加重了对该时期法国汉学工作的忽视。再如都文伟所著《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年,第 112 页。

(上海三联书店,2002),曹广涛所著《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均以中国戏曲在海外的接受为主题,但同样主要聚焦于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方面的情况。显然,受语言问题所限,戏曲在法国的译介长久以来缺乏具体深入的探讨。而法国汉学家在19世纪戏曲翻译期间所撰写的评论与研究文章,国内亦罕有介绍。极少数被译入中文的文章,如大巴赞为《中国戏剧选》所写的长篇学术性序言^①也因译文作者对法国汉学及中文典籍的陌生存在许多较为严重的误译。凡此种种,均造成了这一研究方向上有关法国方面工作的停滞不前。

与中国学者具有显著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学者多从汉学史或中西交流史的角度切入这一论题。他们由于有语言上的优势和资料上的便利,材料掌握较为全面准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4)的《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迄今仍在同类著作中居于领先地位。^②不过,高第书目范围极广,虽然条目撰写分门别类,但毕竟卷帙浩繁,有关19世纪戏曲翻译的相关条目不可能从中凸显出来,获得独立的面貌。这一状况其实也是同类西文著述的普遍特征。如美国学者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所著《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1840—1876),聚焦于西方对于中国观念的形成,在此过程中曾谈及19世纪戏曲翻译,但着墨不多。再如当代学者米丽耶·德特利(Muriel Detricie)的《中国戏曲在西方的翻译与接受》(“Traduction et réception du théâtre chinois en Occident”)一文,上起18世纪马若瑟译《赵氏孤儿》,下至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出访美国和苏联,是对戏曲翻译接受状况全貌的勾勒,时间跨度很大,却未能就具体某一时段或文本作出更深入探讨。显然,西方研究者由于多从汉学史和中西交流的大背景切入,虽能因此获得较大的时间跨度和广泛的涉及面,却也受此视角所限,不太可能对戏曲进行单独讨论,更遑论进入某一具体译本。因此,虽然他们在资料掌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受其特定关注角度所限,也由于缺乏足够的中文语言基础,对19世纪的这次戏曲翻译高潮迄今并未有过具体细致的分析和

① 此文参见钱林森所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戏剧和小说》一书。

② 高第此书有一续作,是袁同礼(Tung-Li YUAN)仿照高第体例所补(*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Yales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 1958),但收录年代已超出19世纪,因而与本课题关系不大。